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论丛



『间性』的凸现

金元浦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论丛

「间性」的凸现

金元浦 著

中国史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间性”的凸现/金元浦著.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1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论丛)

ISBN 7-5000-6551-5

I. 间... II. 金... III. ①文学评论—流派—研究—西方国家
②文学批评史—西方国家 IV. ①I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1253 号

“间性”的凸现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cph.com.cn>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编 100037)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永清县福利工厂胶印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125 字数:267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定价:24.00 元

目 录

一 编

“间性”的凸现

——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化的多元主义与对话交往 …… (3)

寻找新的问题域

——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当代课题 …………… (10)

二 编

西方与中国:二十世纪的语言论转向…………… (21)

西方当代作者中心论的兴起与衰落 …………… (36)

西方当代文本中心论的兴起与衰落 …………… (50)

西方当代读者中心论批评论要 …………… (67)

西方当代对话主义…………… (103)

走向新历史主义:接受美学的转向 …………… (142)

西方新保守主义的流变…………… (162)

三 编

解释学循环与文学意义的范式观…………… (171)

艺术空白:琳琅世界有一同 …………… (177)

妙在虚实隐显间…………… (186)

心理填充与感觉游戏…………… (216)

2 “间性”的凸现

意味的世界·····	(250)
在阐释中流播和发扬·····	(285)
解释·接受反应文论的“中国化”·····	(291)
《圣经》的阐释与《诗经》的阐释·····	(322)

— 编

“间性”的凸现

——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化的多元主义与对话交往

今日的比较文学的确面临着危机。比较文学的生存危机要求它必须突破原有的框架和边界,以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去关注和研究新的论域、新的变革和新的范畴。在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条件下,文化创造呈现出极为丰富的多样性,如何在多种文化对话交往的基础上,超越传统的客观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建构更具活力也更富开放性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理论,是我们理论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国当代诗学经过 20 余年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选择、删汰,已经形成了众声喧哗、百家争鸣的多元共生的总体格局。范式多样,话语丛集,原先西方的几十种文学理论话语经过当代中国学人的改造、融合和重建,已经在当代文学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发挥着重要影响。除了先前的意识形态—政治批评、社会—历史—审美理论话语外,心理—精神分析、人类学—原型—神话理论话语、审美—形式主义理论话语、结构—叙事学理论话语、解释—接受反应理论话语、后现代后殖民理论话语,以及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等众多的理论话语,在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中都已广泛地运用。

这些文学理论的范式和话语有各自的概念体系、核心范畴、方

方法论要求和逻辑运演程序,而且还在运用于中国批评实践中创造性地建立了经典范例,并逐渐赢得了日益广泛的批评共同体。

多元共生是文学文化发展的本然状态。它既对应于文学文化构成的多向度、多层面、交叉性和复合性,又开启了文学创造的多样性和阅读阐释的无限可能性。这种文学文化的多样性正是符合当代现实的合理形态,而不必也不可能把它们一概统一于一或整合于一,甚至回到一种涵盖一切的大一统的文学文化模式中去。

打破了一统的局面,随着理论发展的深化,多元批评和多样性话语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读不懂”现象与话语间的不可通约性走向了沟通交流,于是对话成为“主义”,而对话主义则历史性地隆重出场。

二

我国文学多范式、多话语共生的众声喧哗和多学科、多民族、多文化交往的时空交融的现实,迫切需要相互间的交流和沟通,热烈呼唤着相互理解和融合。而当代各种理论话语的成熟与发展也为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可以说,我国文学一文化在 90 年代中期进入了对话与交流的新阶段。

从西方哲学和美学来看,交往(Communication)和对话(dialogue)已成为当代世界全力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当代许多不同传统的哲学家、美学家都阐发了交往和对话的极端重要性。20 世纪初,马丁·布伯就关注人类相互关系的交往与对话问题。60 年代以来,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分别代表哲学解释学与批判解释学进行的辩论,就以语言的交流与对话为其论之焦点。而普莱纳斯、雅斯贝尔以及阿贝尔则从哲学、人类学、存在主义和先验实用主义出发关注人类的对话、交往与沟通。

在当代解释学各学派及其他哲学、美学理论的倡导下,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众多领域也开始将自己先前孤立自在的学科置于人类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的更为宏大的构架之中。比较诗学研究亦同样跻身于这一新的世纪之潮的潮头。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界将目光投注于前苏联文学理论家、美学家巴赫金的语言对话理论,而曾经引起世界文学界震撼的接受美学,也从发轫初期的极端读者中心论立场逐步走向交流(交往)理论;创立了文学反应动力学的美国读者反应批评家诺曼·霍兰德从心理与精神分析出发,在其先前的双重主动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文学心理与精神的交往(沟通)理论。

其实巴赫金从未使用“对话”或“对话主义”来命名他的任何一部著作。但他在法国和美国最有影响的权威解释者托多洛夫和赫奎斯特则都不约而同地选取了“对话”作为巴赫金理论的核心标志。托多洛夫用《对话的原理》来评介巴赫金的著作,而赫奎斯特则将他编选的巴氏论文集命名曰《对话的想像》。他们都将巴赫金的理论翻译、传释、介绍给他们的国人,并影响了后来的许多学者。所以有位名叫贝洛斯托斯基的巴赫金专家曾断言:“对话”的巴赫金是一个近年来为巴赫金学的学者们所提升、所筹划,甚至所创造的形象;而对话批评则是以他为名制造出来的一个学术“企业”。可见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是当代文化现实走出困境的必然要求,是实践运作的必然结果,也是走向新的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我国 90 年代以来文学—文化已从多范式多话语的共生并在状态进入复调式多声部全面对话的阶段,对话主义历史性地出场已经成为理论界的共识。在我国现有语境中,其现实特征为:

首先,这种对话超越了传统的客观主义反映论,始终保持着对话主体复调式多声部的特征。不同于我国历史上用某一种钦定意识形态来代替、取消或横扫其他理论范式或话语的唯一论模式,我

国当前对话主义的基点在于肯定、承认当代各种不同范式话语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正因为每一话语具有自身切入文学或理解文学的独特角度或框架,因而它才具有深入理解对象、把握对象的部分真理性和片面深刻性。取消了此一理论的独特视角,也就取消了它借以立足的根基,实际上也就取消了对话。对话主义的基本精神表现为两种声音的“相汇”,而不是一种声音的“独白”,是相互平等的对话、交流,而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

同时,我国当代对话主义表现为以文化交流与综合为特征的全面对话。所谓全面对话是指对话具有人类文化生成的根本性。它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现象,浸透了人们的语言,浸透了人类生活的一切蕴含着意义的事物。”(巴赫金语)我国近年来各种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兴起,就是在努力寻求中国与西方之间,现代与传统之间,理论与创作之间,市场规律与道德理想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寻求冲突中的相互作用,撞击中的新的契机,否定中的新的希望与新的可能。在更深的层次上,这种全面对话又表现为跨越学科界限的科际对话,而它们又都体现出当代文化批评、文化研究交流的整合融会的宏观视野。

三

当代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既是当代社会变革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历史转折时期人类自身思维的内在冲突与内部对话。当代文化相对主义的兴起,从一个侧面启发人类重新检视其认识世界的有限性。对话的语言性表明,我们不能狭义地仅仅将语言看作是对话与交流中理解的工具,因为文学、文化传统本身的存在即是一种语言的存在,或曰主要以语言的方式存在,人所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世界只有进入语言,才能表现为我们的世界。语言的

局限,就是历史和对话的局限。人类所有对话中的理解、语言、历史,乃至整个个人的存在,实际上都是未完成的,也是不完全的。所以,传统的终极真理的绝对观以及由此产生的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独白式思维与对话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比较文学的理论思维中,不仅作者与作者、作者与读者、作者与文本、文本与文本、文本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而且在多种学科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正是这种对话展示了人类存在的深刻危机和人类精神世界的无比丰富性。

所以,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作为学科的一种根本特质是对话、沟通和交往理性。对话交往理性作为一种过程体现着人类精神视野的不断融合。从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学实践来看,这种对话交往包含着主体间、学科间、文化间、民族间互相作用、互相否定、互相协调、互相交流的间性。这种间性是对话实践所达到的主体之间、学科之间、文化之间、民族之间共同拥有的协同性、约定性、有效性和合理性。作为一种“主体—主体”、“学科—学科”、“文化—文化”、“民族—民族”间的精神交往,比较文学与比较文论体现了文学—文化中的对话实质,更多的表现出文学—文化交流的可传释、可互换(互相激发)、可再创造的特质。在这种精神交流中,两条不同的地平线(horizon)交汇,形成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人类精神的无穷天地。

因此,建设并进入合理的对话交往语境,关注和寻找“间”性,重建文学—文化的公共场域,就成为比较文学—文化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所以,文学的“间”性: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包括文学交流中的理论共同体、批评共同体及阅读共同体间性——群体间性)、文学与不同学科间的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arity)、后殖民时代的文学的民族间性(internationality)、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就成为

比较文论或比较诗学必须研究的对象。在我看来,寻找间性正是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根本指向。

当然,不同于那种撷取合理要素后的“整合”或“融合”为一,找出统贯一切的本质,构造涵盖一切的宏大体系,也不同于前期解构主义的完全消解、拆除,间性的研究是要探寻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理论范式和不同批评话语之间在历史语境中的约定性、相关性和相互理解性,找出联系和认同的可能性与合法性(客观性)。间性秉持一种建构的姿态。

四

但是,间性的寻求,并不泯灭一切区别。相融性、共同性、交往性并不消泯各自的独特性。实际上,间性的存在正依存于文学—文化的多样性,而文学—文化的多样性则只能通过创新来实现。只有主体的、学科的、文化的、民族的不断创新,才可能保持持续的更加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只有持续的更加丰富的文化多样性,才能激发主体的、学科的、文化的、民族的进一步的创新。创新是在历史中承继和在历史中衍化的,创新是一个变革的过程。

然而,创新又是一个竞争的过程,创新必然通过竞争来实现。因而那种将文化相对主义绝对化,将其推到极致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比较诗学的建设只能超越传统的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二者,在创新与竞争中曲折前行。

有论者认为今天“我们所使用的全是西方的话语”,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因而我们“失语”了。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真问题。从根源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一种西方话语,但它明显已成为当代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传统。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无可否认,西方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理论资源,西方

理论构成了我们主要的理论参照系之一。我们的理论研究中也确实存在着大量追逐西方理论时髦,新鲜概念术语满天飞的现象。但是,术语的借鉴与否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是否从逻辑、历史和现实出发找到了我们发展的真问题,找到了问题,术语是第二层的问题,它可以选择(从中外古今)、借鉴(从国外)、翻新(从过去)、创造(命名),可以根据需要来“制造”。至于术语概念本身到底来自哪里,其实并不重要。

实际上,所有的西方话语在进入中国时都已经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删汰和改造过程。当我们在用汉语说这种话语(概念)时,当这种话语成为一种我们所使用的批评话语(概念)时,它便已赢得共同体的认可,就已经经过了主体(前理解结构)的选择与淘汰,经过了当下场域与文本语境的过滤,经过了对需要的反对与认同的化合过程,就已经是一种中国本土的话语了。被我们笼统地称为“西方”理论家的雅各布森、托多洛夫、巴赫金、马尔库塞、保罗·德·曼等,无不如此,其实都经历了不同语言与文化间的改造、融合和重塑。重塑就是一种创新。

和而不同,同则不继。文化范式与话语的不同主体、不同学科、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多样化引发了它们之间的比较、对话与竞争,比较、对话与竞争又进一步催生了创造的多样性。没有比较,就不能显现差异,没有对话,就没有彼此间共同性,也就没有交流的基础;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的动力,也就没有创新。求同存异,学术文化通过竞争发展,竞争是优化发展的基本途径,而创新——筹划、设计、投射,则是竞争中制胜的法宝。因此,在多样化现实中,当对话建立了同一性基础时,竞争就会倏然莅临。

寻找新的问题域

——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的当代课题

—

当代文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世界来看,世纪之交的文学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比较文学也正在快速地走向历史,走向社会,走向比较文化。这种变化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转型。全球化背景随着进一步的开放日益进入我们生活的中心。电子媒质的兴起向纸媒质的一统天下发出强劲的挑战。媒介文化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生活。大众文化走向前台,城市文化快速传播与蔓延,时尚文化大批量复制,采用了浪潮式的运作方式。视像文化占据人们生活的主要空间,在这样一个读图时代里,甚至视像(镜像)已反过来影响纸媒质文化,如由电视剧、电影改编的文学作品和卡通读物,各类读物中的图像、影像所占据的日益增多的比例。网络文化正在逐步改变着我们的交往方式。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社会需要不断提高。在基本的物质需求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因此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极大增加,人们除了对书籍的需求之外,更需要音像、影视、网络艺术等视觉文化产品,对娱乐服务、旅游服务、信息与网络服务的需求。即使是物质层次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的文化化、审美化了。

现实向我们提出了要求,比较文学、比较文论必须重新审视原

有的对象,越过传统学科观念的边界,关注文学与视像文化之间,关注文学与媒介文化之间,关注纯文学与大众流行文化之间,关注文学与网络文化之间,关注文学与性别文化、时尚文化、身体文化之间的区别、联系,进行比较、对话和沟通,所以,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必须扩大、更新它的研究范围,重新考虑并确定它的研究对象。

二

也许,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当前比较文学、比较文化最切近的问题。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新技术革命,以及由此伴生的知识文化经济的新的革命。文化发展如果不与这种高新技术与经济的革命性突破相结合,就会被飞速发展的现实世界淘汰出局。因此,建设与未来世界新的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相协调的新的文化形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现代高新科技革命对人类当代文化的发展正在产生着以往所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当代科技的发展引起当代社会主导传媒形式的变化,而主导传媒形式的变化则引起了原有艺术生态格局的全面变化。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传播技术、自动化技术和激光技术等高科技的发展,现代科技的广泛运用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之中,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旋风,已经导致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和传统文化形态的更新。文化生产方式工业化,实现了从文化手工业到现代文化大工业的深刻变革,直接导致文化工业革命。文化作坊让位于文化工厂,社会文化大生产取代个人文化小生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高新技术的产生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不仅导致所有传统艺术形态的升级换代和现代更新,而且创造了大量崭新的艺术形式。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文化传播随着现代大众传媒从纸媒质到电子媒质的变换,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媒体革命。广播、电影、电视、音像、多媒体网络艺术相继产生,不仅创造了崭新的文化产业——媒体产业、电影产业、电视产业、音像产业、广告产业、IT 产业,乃至娱乐产业、体育产业和艺术表演产业,而且带来了旧的传播媒体的更新发展,形成了专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大众传媒全新格局。如果认为文化媒体革命仅仅只是传播方式变革,无疑是极大贬低了这次革命的重大意义。因为它同时带来了文化本体革命,实现了从纸媒质文化向电媒质文化的变革,荧屏取代舞台成为表演艺术的主要天地,广播文化、电视文化、电影文化、音像文化乃至网络文化向图书印刷文化发出挑战,视觉文化成为新兴的主导文化形式。文化不断创新、扩容,文化的领土前所未有的猛烈扩张。

如果说中国 20 世纪初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实现了中国文化新旧置换,是一场具有中国历史意义的文化本体革命,那么,以电子媒质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媒的升级换代和创新发展,使人类文化具有了崭新的转载形式,不仅实现了人类文化史上继纸媒质发明之后又一次深刻的文化媒体革命,同时也创造了崭新的现代文化,实现了文化本体的更新发展和创新扩容,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革命。

与现代工业和信息文明相对应的文化艺术是广播、影视、音像、网络艺术。广播艺术、电视艺术、电影艺术等都是现代化工业文明的产物,我们时代的最新创造是音像、多媒体艺术形式。它们组成了光与电的序列。它们是间接艺术,并不直接面对观众,艺术本体通过电子艺术媒体传播。在间接媒体艺术领域,如今以它们为代表的电子媒质艺术已经动摇了以图书报刊为代表的纸媒质艺术的霸主地位,即使在广播、影视、音像多媒体艺术之间也是代际更替,相继领先发展的。广播、电影、电视、音像多媒体相继问世,曾依次